

走向繁荣的 战略选择

STRATEGIC
CHOICE
FOR PROSPERITY

厉以宁

孟晓苏

李源潮

李克强

◎ 著



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

厉以宁 孟晓苏 著
李源潮 李克强

 经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 / 厉以宁等著. —北京: 经济日报出版社, 2015. 9

ISBN 978 - 7 - 80257 - 877 - 7

I. ①走… II. ①厉… III. ①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中国 IV. ①F1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18257 号

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

作 者	厉以宁 孟晓苏 李源潮 李克强
责任编辑	林 珏
责任校对	李 进 刘雅溪
出版发行	经济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右安门内大街 65 号 (邮政编码: 100054)
电 话	010 - 63567679 (编辑部) 63567687 (邮购部) 010 - 63516959 83559665 63538621 (发行部)
网 址	www. edpbook. com. cn
E - mail	edpbook@126. 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鑫瑞兴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3. 25
字 数	175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0257 - 877 - 7
定 价	78. 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再版说明

《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第一版出版于1991年。时隔22年的今天再版发行，满足广大读者的强烈需求是非常重要的原因。

读者对本书的强烈愿望来源于本书堪称理论经典的内容。本书出版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其时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进入关键时刻，在这个大背景下，本书作者就如何进一步加快经济改革，使中国经济进入良性发展的轨道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和精辟的理论阐述，并就实践的路径进行了深入探讨。很多读者是在20年前看过这本书，对书中的内容至今记忆犹新，并强烈要求本社再版。

党的十八大提出到2020年全面实现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而要想全面实现这个目标，全国人民在党领导下，还需要做一番艰苦的努力。这其中，包括审视过往改革开放的得失，进一步明晰理论要点，更加坚定地规划路径，都应是这种努力的原有之意。我们认为，尽管20多年过去了，重读本书对于回顾中国经济改革以来的理论与实践历程，有不可多得的历史意义。而更重要的是，本书内容对于解决当前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毫无过时之感，仍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作用。因此，在征得厉以宁教授同意之后，本书再版时对原内容未做改动。

本书上世纪九十年代出版时，正是我国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面转变的时期，本书的理论立意自然有那个时期的烙印，尤其是经济数据还停留在那个年代。但是，我们今天再版这本书，读者重读这本书，意义在于重温这本书的理论创新、超前思维和大国繁荣的路径规划，结合今天中国在深水区改革的大背景，相信读者一定会读出新意并大受裨益。

前 言

本书由厉以宁同他的三个学生孟晓苏、李源潮、李克强合著。孟晓苏撰写第一章（经济改革战略的探讨），李源潮撰写第五章（企业集团的发展途径），李克强撰写第七章（农村工业化：结构转换中的选择），其余部分由厉以宁撰写。

本书取名为“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主要出于以下考虑。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算起，改革至今已经超过十二年。在经过历时两年的治理整顿之后，当前我们正处于改革与发展的关键时刻。究竟怎样才能加快经济改革的步伐，怎样才能使我国经济转入良性循环轨道，我们必须从战略的高度对今后的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进行认真的思考，选择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的道路。在这个领域内，经济理论界是有争论的。我们所陈述的一系列看法以及所提出的改革方案，只是众多观点与方案中的一种，供决策当局选择。当然，展望今后十年，我们在提出自己的方案及其实施效果时，多少带些经济预测的性质。这是因为，根据我们的看法，只要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得当，九十年代内中国经济的繁荣是可以期待的。

不可否认，对九十年代的中国经济的预测有一定的困难。首先，经济生活中充满着不确定性，从国际政治形势的变幻到每个消费者的行为的不规范，都可能对正常的经济运行产生干扰，从而使经济预测难以准确。其次，预测者所掌握的信息毕竟是有限的，从而只可能根据所掌握的不充分信息作出预测。最后，预测者本人总是有自己的经济观点的，因此在分析经济信息和根据这些信息进行判断时，很难避免掺杂了主观的意见。不同的经济预测者即使面对着相同的经济资料，也可能得出截然相反的看法，究竟谁对谁错，只有让以后的实践来检

验。尽管这样，本书还是在陈述作者的看法和提出可供选择的方案的基础上，对今后一段时期内中国的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趋势作了一些预测，并且对中国经济的前景持有乐观的态度。

本书关于中国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的基本思路依然是坚持企业改革是中国经济改革主线的观点，即把企业改革放在关键的地位，认为价格的放开是企业改革取得成效以后所形成的结局，而不可能是经济改革的突破口。然而在公有制基础上实现股份制的途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企业集团的组建，乡镇企业的发展、计划与市场的结合方式等问题上，要比厉以宁以前出版的各个著作中所阐述的具体得多、详细得多。这是本书的明显特点。

本书写作过程中，曾得到赵履宽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刘炳瑛教授（中共中央党校）、邬翊光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刘方棫教授（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萧灼基教授（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王恩涌教授（北京大学管理科学中心）、陈良焜教授（北京大学管理科学中心）的帮助，谨向他们致谢。

目 录

前 言

第一章 经济改革战略的探讨	1
第一节 经济改革战略问题的提出	1
一、经济改革战略研究的必要性：改革实践提出的课题	1
二、经济改革战略研究的现实性：对经济改革周期性变动的思考	5
三、经济改革战略的含义	7
第二节 经济改革的起点模式与目标模式	8
一、起点模式的研究	9
二、目标模式的研究	10
第三节 经济改革的过渡模式	11
一、过渡模式的含义	11
二、经济运行机制改革的过渡模式	12
三、企业改革的过渡模式	13
四、对过渡模式的理论概括	14
第四节 经济改革的利益机制	16
一、经济利益机制：改革的动力与阻力	16
二、运用利益机制的主要原则	19
第五节 经济改革的实施问题	21
一、经济改革的彻底性与渐进性的统一	21
二、总体目标的确定与阶段目标的分解	22
第二章 企业改革——经济改革的主线	25
第一节 企业改革与治理通货膨胀的关系	25
一、对近年来物价上涨问题的认识	25
二、从需求和供给两方面来治理通货膨胀	28

第二节	企业具有充分活力是价格放开的前提	33
一、	正确对待战后初期日本价格改革的经验	34
二、	企业家素质与价格改革	39
三、	价格放开的环境及其与企业改革的关系	41
第三节	企业改革与宏观经济调节的关系	44
一、	宏观经济调节的基本方式	44
二、	宏观经济调节手段发挥作用的条件	47
第三章	从企业承包制向股份制的转变	51
第一节	企业承包制的过渡性质	51
一、	企业改革的基本任务	51
二、	承包制只是传统企业体制的一种改良	52
第二节	国营企业在公有制基础上实现股份制的途径	56
一、	公有制的界定	56
二、	国营企业在公有制基础上实现股份制的六个途径	58
三、	多种类型的股票交易和股票市场	64
第三节	本企业职工入股与股份合作制企业	65
一、	关于本企业职工入股的合作经济性质	65
二、	资产存量债权化或资产存量租赁制与股份合作经济	67
第四节	企业基金会与企业基金股	68
一、	企业股——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68
二、	企业基金会持股的可行性	69
第四章	国有资产的管理	71
第一节	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	71
一、	研究国有资产管理的意义	71
二、	近期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	73
三、	中期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	76
四、	长期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	82
第二节	国有资产管理与资源配置	85
一、	资源配置的中心问题——效率与公平	85

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同效率与公平的关系	86
第五章 企业集团的发展途径	90
第一节 关于企业集团的一般分析	90
一、我国经济改革中的企业结构重组	90
二、资本主义经济史上的企业重组	91
三、企业集团是较高层次企业联合体的特称	93
第二节 我国企业集团的现状分析	95
一、企业集团的概念、特征与内部结构	95
二、企业集团的分类	98
三、企业集团的产生途径	100
四、企业集团的经济功能	101
五、企业集团发展过程中的矛盾	106
第三节 国家对企业集团的导向与政策	109
一、对企业集团的发展导向	109
二、关于扶持企业集团的政策建议	115
第六章 以增加科技投入的方式促进市场繁荣	119
第一节 解决市场疲软问题的对策选择	119
一、市场疲软的结构性的	119
二、若干治理市场疲软的对策的分析	121
三、启动资金投入科技开发领域的作用	123
第二节 把科技开发与解决市场疲软问题结合起来	126
一、重视投入科技的资金的使用	126
二、持续的市场繁荣有赖于科技开发投资的不断增加	130
三、增加科技投资，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技术结构	134
第七章 农村工业化：结构转换中的选择	137
第一节 工业化进程的新变化	137
一、与农村分离的工业化进程	137
二、农村工业化目标的确定	140
第二节 三元经济结构的形成	142

一、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的特殊性	142
二、结构转换的选择	144
三、农村工业部门的成长	146
第三节 三元经济结构的相互关系	151
一、农村工业部门与农业部门的关系	151
二、农村工业部门与城市工业部门的关系	156
三、对三元经济结构的总体性考察	159
第四节 协调三元经济结构之间关系的对策选择	161
一、推进三元经济结构的发展	161
二、促进三元经济结构的协调	162
三、协调农村工业与农业之间关系的对策	165
四、协调农村工业与城市工业之间关系的对策	166
第八章 计划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结合	173
第一节 我国经济的非均衡性质	173
一、两类经济非均衡	173
二、资源配置的市场方式的局限性	174
三、资源配置的计划方式的局限性	175
第二节 计划工作的内容以及计划与市场之间的关系	176
一、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的结合	176
二、计划工作的三项主要内容	177
三、提高计划配额水平的必要性	180
四、市场疲软条件下的计划配额	183
五、计划与市场之间关系的动态考察	187
六、间接的计划调节与直接的计划调节	190
七、两条警戒线与间接调节、直接调节的关系	192
结束语：改革是不可阻挡的趋势	195

第一章 经济改革战略的探讨

第一节 经济改革战略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的经济改革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十年中国民生产总值平均递增 9.5%，国民经济的活力有了很大的增强，国家的经济实力和人民的生活水平都有了显著的提高，对外开放政策打破了长期的封闭状态，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使对外贸易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日益上升，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份额由 1979 年的 0.97% 上升到 1988 年的 1.16%。^① 但是同样引人注目的是，在中国的经济改革进程中，出现过曲折与徘徊，出现过冒进与失误，出现过久攻不下的难点，也出现过种种不尽人意、甚至不堪承受的问题和困难。一度加剧的通货膨胀和渐趋严重的腐败现象曾经使经济改革的环境恶化。紧接 1988 年抢购风潮而来的经济滑坡、市场疲软，又使整个经济改革与发展遇到困难。现实引起人们对这一系列现象与问题的深层思考：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在战略上有哪些主要经验，而改革的失误在战略上又有又哪些基本教训？这些无疑都是关系到下一步改革进程的重大理论问题。

一、经济改革战略研究的必要性：改革实践提出的课题

从经济改革的十年实践来看，几个主要领域的改革在进程与效果

^① 参看世界银行：《中国：国家经济备忘录》，1990 年 3 月。

上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

率先兴起的农村改革，是以 1979 年主要农产品收购价格的调整作为序幕的，随后，在中国最穷困的一部分地区悄然兴起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又称“大包干”），便以其劳动计酬同产量的直接联系、生产者的经营自主权和明显的增产效益受到广大农民的赞同。在党中央的领导下，这一改革逐步推开，尤其是从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土地责任制的发展（承包土地使用权十五年不变），极大地解放了长期被旧体制禁锢住的农村生产力，不仅使农户成为独立的生产者和经营者，而且使农民成为部分生产资料的直接拥有者，部分地改变了农村的产权关系。与此同时，取消农副产品统派购制度，市场机制逐步被引入农村经济生活，八亿农民迅速走上商品生产的轨道。粮食的连年增产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推动了农村的劳力、资金、土地、技术等资源的重新组合，使中国的农村工业与第三产业迅速兴起，乡镇企业以其灵活的经营机制，在种种客观的与人为的困难和压力下迅猛发展，成为国民经济中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① 这期间，农民的人均收入增长了一倍多。尽管尚有约 8% 的农户还面临着贫困的压力，但绝大部分的农民已解决了温饱问题，少部分经济较为发达地区的农民已率先进入“小康”。农村改革的迅猛进展震撼了整个旧的经济体制，直接推动了流通、分配、信贷等领域的改革，并为城市改革提供了勇气和经验。农村第一步改革无论是作为农村经济改革总过程中的一个子过程，还是作为全国经济改革总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都是成功和具有重大影响的。

与农村改革相比，在城市企业改革的思路与步骤上就显得相对迟疑与踌躇。企业改革是从 1979 年到 1981 年的扩大经营管理自主权试点起步的，这主要是由于过去企业完全是行政机关统收统支的附属物，不仅毫无自己的利益，而且整个生产、经营全部控制在行政机关的指

^① 参看本书第七章。

令性计划下，几乎毫无自主权。但当企业发现这一改革实际上主要是实行利润留成制度，而企业迫切需要的生产计划、产品销售、物资供应和用人等方面的权力因为体制的束缚并未落实，当国家也发现企业在利润留成制度下并不能有期望的积极性时，“放权试点”便被一股以“包字进城”为代表性口号的第一次企业经济责任制的浪潮所淹没。企业经济责任制在具体实践中，主要是从分配入手，采取利润留成、盈亏包干、以税代利、自负盈亏四种基本形式解决国家与企业之间的经济责任，采取同职工收入挂钩的全面经济核算，解决企业同职工之间的经济关系，并强调责、权、利的结合。这项改革在一些企业中取得了成效。可是随着“放权让利、搞活企业”的发展，立即出现了企业“苦乐不均”的问题。企业的情况千差万别，在核定企业分成基数与递增比例时难以定得合理，同时由于在计划体制下承包企业的各项计划指标的确定都只能按“基数法”，即在上年实际完成数的基础上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来商定，而实际上企业只负盈不负亏，因此又进一步产生了“鞭打快牛”的问题。在这种背景下，人们或是出于想为企业创造平等竞争环境的动机、或是出于要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的动机，萌发了“利改税”的思想，并迅速影响了国家的决策。“利改税”在巩固国家财政收入方面的成效是明显的，而“创造平等竞争环境”的预期随着“利改税”实践的检验和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改革方向的确化，逐渐显现出其不合时宜。这是因为，如果国家真的可以分离各种生产要素的收益，用精心设计的巧妙方案来取代市场机制的作用，那么传统的计划体制就可以修修补补而不需要做实质性的改革了。在实践中，由国家与企业的特定关系所决定的公有制企业的不平等也没有能得到改变，陷入了国家政策与企业对策的循环。稍后，理论界一些人提出从理顺产权关系入手，用公有股份制的形式重组中国的国营企业，以彻底解决行政对企业的控制，并加强企业行为的自我约束的构想，引导人们走出了“放权”与“收权”的思想方法，开始了对重造经济微观基础的探讨。

如果说对企业改革的曲折尚难有定评的话，价格改革的思路、操作过程与结局便更耐人寻味。价格改革思想的萌发几乎是与创造企业平等竞争环境的想法同时产生的，因为人们已看到传统的体制导致不合理的价格体系，为社会提供了一种错误的信息与选择标准，引起经济结构的全面扭曲，使得企业难以真正面对市场，于是以理顺价格或是改变价格形成机制为主要话题的价格改革便理所当然地提上了日程。1984年和1985年两次生产资料价格的开放，出现了以价格双轨制为核心，计划价、浮动价和市场价并存的价格体系。但价格双轨制的弊端同样是明显的，它是在产品经济与商品经济板块式结合的思路指导下提出来的，其核心的内容就是对同一产品实行“计划内”与“计划外”两种调节，价格双轨制使市场部分地开放了，但市场机制并未合理形成。不仅如此，它还为依附于传统经济体制的“官倒”提供了肥沃的土壤。现实使一些人们认为价格双轨制的过渡时间不能太长，价格改革是想绕也绕不过去了。另一方面，包括价格补贴在内的各种补贴直线上升，补贴已占到国家财政支出的30%，到了使政府不堪负担的地步。理论界有些人把价格改革说成是“一次性的大手术”，描绘出一幅“过关有风险，关后是平川”的诱人图景。结果，准备强行闯过价格改革关的意向触发了1988年夏天全国性的抢购与挤兑风潮，消费者纷纷将金融资产转移成实物资产，全国人民对于这个关系到他们长远利益的价格改革方案竟然用“货币投票”行使了否决权。这严重恶化了改革的环境，人们对通货膨胀、分配不公、腐败现象和治理整顿不力的强烈不满情绪，很快从各个方面表现出来，中国的经济改革事业为此付出了重大的代价。

以上是对十年改革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些改革过程与结局的简单回顾。正是这些在进程上或顺畅或阻滞，在结局上或成功或失败的具体内容，构成了中国十年改革的历史，并使之具有丰富和深刻的研究价值。

某项改革的成败并非仅是由其具体的规律决定，更不是若干偶然

因素所促成。至少在“目标是否正确”“条件是否具备”“操作是否得当”这三个问题上，有其共同的规律可以追寻，而对这种战略问题的研究绝不是对具体过程和具体经验教训的研究可以取代的。尤其是在研究经济改革实践遇到的挫折中，还应看到它的多方面、多层次的原因。完全归咎于决策失误，并非实事求是。同样，把全部失误归结为客观必然，也不是实事求是。仍以改革以来通货膨胀的恶化为例。改革伊始，决策部门和经济学家对群众承受物价上涨的能力作了大量的讨论。有的认为物价上涨的上限是2%~3%，有的认为是5%~6%，有的认为只要低于存款利率即可，尽管意见不一，但当时总还有个可以衡量的限度。可是，后来实际上放松了对这种限度的把握。因此，正确的态度应当是既要搞清楚哪些挫折具有难以避免的客观性，又要搞清楚哪些属于决策失误。在正确指出决策失误的基础上，还应当深入探讨造成这种失误的层次与原因。例如，是目标选择层次上的错误还是操作层次上的失误，是总体操作上的失误还是局部操作上发生了影响到全局的失误？经济改革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在成功与失误问题的研究上也应力戒简单化、表面化。为此，从改革战略的高度来深入研究成功的进程与经验，判断失败的层次与原因，确有其必要性。

二、经济改革战略研究的现实性：对经济改革周期性变动的思考

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都不是直线进行的，经济运动本身有其周期性。所谓经济周期，是指国民经济总量呈现周而复始变化的状况。它在我国的存在已为我国四十年经济发展的历史所证实。（见图1）

政府实行某种宏观政策虽然可以改变经济周期的频率、振幅和发生的形态，但没有也不可能消除经济周期本身。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实行改革政策十年中的经济状态也呈现出周期性的特点。（见图2）

图1 工业总产值年增长速度变化曲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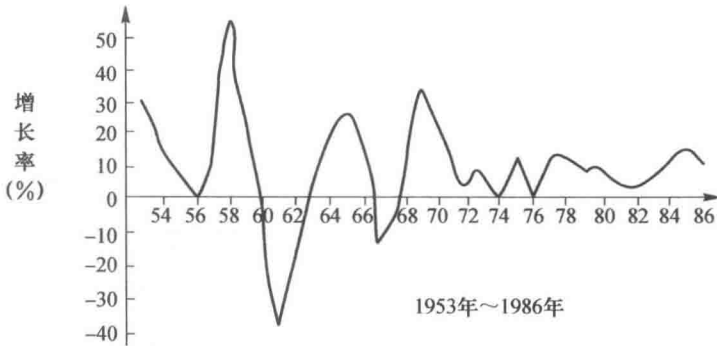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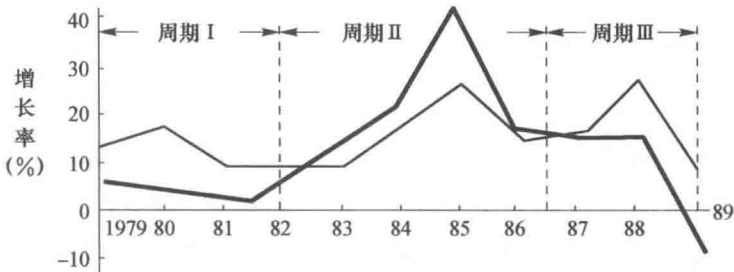


图2 全民所有制单位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增长率曲线 (——)

社会商品零售额增长率曲线 (—)



从图2可以看出,自1979年我国实行经济改革政策以来,经济形势有过三次高涨期,时间分别为1978~1979年、1984~1985年、1987~1988年。每一次高涨的基本条件都是与农产品的增长、国内供需差率较小、国际收支的顺差和价格相对稳定有关,1979年以来这三个高涨期的出现,显然与实行改革政策有关,如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改革方针。农产品收购价的较大幅度上升与工业企业实行的放权让利试点;1983年和1984年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全面推开、生产资料市场的部分放开、工业企业承包制的实行;1986年和1987年国营企业推行改革和部分农产品价格的放开等等。在每一个经济高涨期都可以看到经济与行政决策权的进一步下放,这种放权对于微观的搞活无疑是有重要意义的。

以上说明，经济发展有其客观规律，经济改革也有其客观规律。在经历了三次经济发展与经济改革的周期性的起伏之后，研究一下宏观战略问题是有意义的。客观规律并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但是人们可以认识这些规律，避免人为地加剧这种周期性的震荡，使经济得以稳步发展。

特别应当指出的是，改革十年来，在人们对于改革的认识和改革理论的研究上也有若干次起伏。如果从客观上将几年来改革理论的研究与深化当作认识的第一阶段，将1989年以来理论界的反思当作认识的另一个阶段，那么到最近重新开展的对于改革理论的进一步探讨，应当说也已完成一个认识上的周期。经历了这个过程之后，中国的经济理论界可能正站在实践与理论的新的起点之上。这也是从战略上研究改革问题的好时机。

三、经济改革战略的含义

战略一词的本意是基于战争全局的分析、判断而作出的筹划和指导。战争的胜败首先取决于战略是否正确。战略左右战争全局，与从局部出发的战术相比，它居于更重要的位置。我国经济学界较为普遍运用战略这个概念，仅是最近几年的事情，并且主要是在经济发展学研究领域。

同样，经济改革也有其战略问题。经济改革的战略是研究改革的国情基础、改革的奋斗目标以及达到这个目标的途径、方法和部署。基于上述认识，经济改革战略至少应包括以下三个层次的内容。

(1) 经济改革的起点模式与目标模式，即“改革初始位置在哪里”“改革方向是什么”等问题；

(2) 经济改革的过渡模式，即改革的途径与方法问题；

(3) 经济改革的利益机制，这是研究改革的动力与阻力，以及有关操作技术的问题。

三个层次的经济改革战略问题是相互关联的，在研究的深度上是